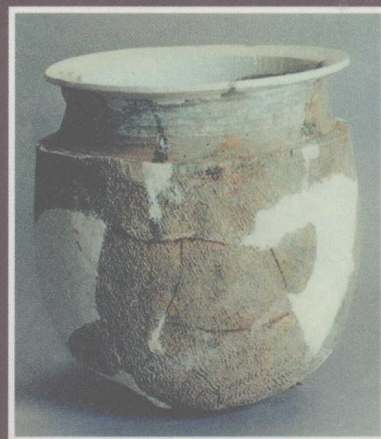


中国南方考古
与
百越民族研究



彭适凡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中国南方考古与百越民族研究

彭适凡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选录了作者数十年来有关江西和南方其他一些地区先秦考古学和百越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共30篇,除《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大力加强南方文物考古》一篇代前言外,上编计有论文18篇,主要探讨中国南方地区(含江西)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先越民族的两种生产工具即有段石铤和有肩石斧以及有关南方地区商周时期几何形印纹陶、原始瓷、早期青瓷、玉牙璋和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玉“羽人”等问题的专题研究;下编计有论文11篇,主要是对南方地区先越及尔后泛称的百越民族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杰出贡献和长江中游地区南岸古铜矿带主人族属扬越及其更替过程以及赣、闽武夷山地区悬棺葬制族属系扬越等问题的专题论述。

本书可供国内外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南方考古与百越民族研究 / 彭适凡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03-022325-8

I. 中… II. 彭… III. ①考古—中国—文集 ②百越—民族历史—中国—文集 IV. K87-53 K2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8015号

责任编辑: 孙 莉 王 钰 / 责任校对: 曾 茹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王 浩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年1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1/2 插页: 1

印数: 1—1 500 字数: 362 000

定价: 1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目 录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大力加强南方文物考古(代前言) (1)

上 编

- 长江文化的特点及研究的意义 (6)
- 试述先越民族的两种生产工具 (10)
- 试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兼论有关的几个问题 (17)
- 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模式的
个案研究 (26)
- 江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与夏文化的南渐 (39)
- 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纪要 (50)
- 试述南方早期印纹陶的特点及其渊源 (61)
- 从原始瓷器到早期青瓷及其与印纹陶的关系 (66)
- 试述中原印纹陶及其与南方印纹陶的关系 (71)
- 中国南方与南太平洋地区古代印纹陶的比较研究 (76)
- 略论香港地区出土古代印纹陶 (81)
- 一部编著成功的田野考古报告集——评澳门地区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
《澳门黑沙》 (88)
- 谈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商代玉“羽人” (93)
- 礼器“牙璋”的类型学研究——兼论香港大湾新出牙璋的年代 (102)
- 新疆和田玉输入江南始于商代考 (115)
- 江西吴城青铜文化不是中原商文化的一支 (120)
- 江西吴城青铜文化的再探讨 (127)
- 三城三河相套而成的古城典型——江苏武进春秋淹城个案探析 (139)

下 编

- 新石器时代赣江流域居民族属考 (152)
- 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 (159)
- 从印纹陶对西南和台湾等地的影响与传播看百越民族的流向 (165)
- 百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卓越贡献 (174)
- 论扬越、干越和于越族对中国青铜文化的杰出贡献 (184)
- 岭南民族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岭南民族源流考》 (194)

“吴头楚尾”地带古铜矿年代及其族属考	(196)
瑞昌商周铜矿遗存与古扬越人	(207)
论武夷山地区悬棺葬制的族属——兼及其年代	(216)
江西悬棺葬的分布及贵溪崖葬的有关问题	(225)
再论龙虎山悬棺葬的若干问题	(236)
后记	(243)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大力加强南方文物考古 (代前言)

经过一年来的多方努力，在众多学者和领导的关怀支持下，改刊后的《南方文物》第一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南方文物》前身为《江西文物》。《江西文物》自公开发行以来，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与关怀，他们除了经常赐稿外，还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希望《江西文物》能扩大组稿范围，使之成为能够反映南方地区文物、考古学界科研成果的共同学术园地。多年来，我们在考古学研究和办刊过程中，也深感如若将我们的研究和刊物视野仅局限于江西的范围，实难以提高考古学研究的水平和刊物的质量。因为古代广袤的南方地区是没有省界的，其文化的发展是有机联系着的，其文化发展的区、系、类型又是跨今天省区的，因此，为了推动整个南方地区文物考古学研究、繁荣学术事业，有必要开辟一个共同的学术园地。作为江西的考古工作者能为南方各省区的同仁们奉献一点微薄之力，能为构筑中国南方古代文明研究的大厦增添一块新的砖石，实感无限欢慰与幸福！

中国南方，概而言之系指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科学的称谓应大体包括北纬33度以南直至南海诸岛等地。这里，除以长江水系为主体外，尚有珠江、怒江、澜沧江和钱塘江等水系。长江以它磅礴浩荡之气，一泻六千三百余公里，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诸省市，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山川秀丽。与华北地区比较，南方的河汉密如蛛网，湖泊星罗棋布，既有高山峻岭延亘不断，又有山谷平原犬牙相错。东南及南面濒临大海，西南毗邻南亚，这就为通向海外，首先是与太平洋地区海洋文化的交往，即历史上所谓“海上丝路”、“陶瓷之路”和“西南丝路”的开通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是上述这些特有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孕育了中国南方地区特有的与中原相异的古代文明。

辽阔的江南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汉文史籍记载的贫乏，很长时期以来，它的历史被扭曲描绘成愚昧、落后的所谓“蛮荒”之地。多少年来，教科书是如此写的，人们也是这样认识的。近代中国考古学产生后，其研究范围又主要局限于黄河流域，南方地区基本是空白，故到1959年郭沫若也只能吟道：“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参观安阳后冈圆形殉葬坑记事诗中一首）

然而真实的历史果真如此吗？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十余年来，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

蓬勃发展，南方各省区的考古新发现捷报频传，诸如湖南的彭头山、浙江的河姆渡和良渚文化的反山、瑶山遗址以及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江西樟树的吴城遗址和新干的商代大墓，等等。这一个又一个重大考古发现不能不引起人们进行反思，它们的发现不能不说是传统史学观点提出的严峻挑战。任何一个考古或历史学者，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只要有机会亲临这壮观的考古现场，目睹这件件璀璨夺目的文化瑰宝，无不为其惊人的创造力所倾倒，而流连忘返；无不承认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南方的古老文明如同中原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祖国的南方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又一发源地。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其特点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影响深远。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中心。从远古时代起，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勤劳、智慧的祖先，在农业、畜牧业以及青铜铸造业等方面都有很多创造，特别是率先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更是大大超过其他地区，并给予了周边邻近地区以强烈影响。但是，黄河流域以外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其古代居民，同样有着卓越的创造和发明，为中国古代文明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距今 200 万年的巫山人和距今 170 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化石的发现，证明我国南方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中心之一。

距今七八千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和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稻谷壳的发现，不仅证明南方地区是我国水稻最早栽培地区，也是亚洲及世界上稻作文化最早产生的地区之一。

浙江河姆渡遗址大量带榫卯结构建筑构件的出土，反映南方古代居民高超的木作技艺，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是空前的杰出创造。

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批用于纺织的木、角、骨、牙器以及发现刻有编织纹和蚕纹图案的象牙盅形器，这表明我国最早的养蚕是从南方开始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明显的丝、麻织品，且多呈平纹组织，说明最早的丝织品也产生于南方。

良渚文化高超的玉器制作技艺深刻地影响了中原，殷商墓葬中大量出土的某些玉器造型和上面的兽面纹等应来自南方，中原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比南方更早、更多、更精美的玉器。

长江上游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和中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两个青铜王国的发现，表明在中原的殷商文化之外，长江流域尚有东、西两个相对独立的青铜文化中心。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和皖南古铜矿遗址的发现，表明时代最早、规模最大、采炼技术水平最高的遗存是在长江流域。考古资料表明，南方地区有可能是我国冶金术最早起源地之一，也是率先过渡到铁器时代的地区。

当然，南方古代先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还有很多方面，如耒耕农业的较早出现，釉陶和原始瓷的较早烧造，凡此种种，这些贡献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民对全人类作出的一份贡献。

既然南方地区有这么丰富的古代文化内涵，又有其特定的地域，因此，加强南方地

区的文物考古工作,深入开展南方古代文化的研究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说,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并非凭空杜撰,她是华夏族为主体的各地区、各民族的所有优秀文化的统一体和融合体。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就必须深入发掘和研究各个时期、各个地域的文化,只有把各个地域优秀文化研究清楚了,我们才谈得上继承和弘扬,才能有力地批判民族虚无主义。

研究南方古代文化,在文献记载贫乏的情况下,考古学所获取的文物史料显得特别重要,它是最有力的带有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但是,仅止于此是不够的,尤其是时代发展到今天,更要求我们不断引进一些现代自然科学手段,把考古学与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以及一些边缘科学结合起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把南方古史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开展南方考古学研究,需要结合的诸学科中首要的是民族史学科。“文化”离不开“人”的创造,创造这些南方古代优秀文化的居民是些什么民族?据载,4000年前,亚洲东大陆上主要分布着三个大的部落集团,即华夏(又称河洛)、东夷(又称海岱)和三苗(又称江汉)。“三苗”是广泛分布在南方的一支大的氏族部落。经过尧、舜,特别是禹的长期征讨,“三苗”逐渐消失。“三苗”的一支越族开始在南方地区崛起。“越”史称“百越”,其种姓繁杂,支族众多,有所谓扬越、干越和于越,以及瓯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和滇越等。在西南地区则有“百濮”族系。所以说先秦南方的古代居民主要应是三苗——百越与百濮族人。汉以后,由于民族的大融合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汉文化随之成为南方地区的主体文化,但一些省区仍然散居着很多少数民族,直到今天,仅与百越族有关的后裔就有高山、黎、壮、傣、畲、布依、毛南、水、侗、仡佬、仡佬等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创造的文化无疑是南方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南方古代文明必然要和创造这些文明的南方古代民族与历史时期的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这是毋庸置疑的。

开展南方考古学研究还必须结合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中国南方地区的历史、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与地处南亚、东南亚地区以及其他环太平洋地区国家有特别密切的关联。由于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基本相近,它们之间在古代文化面貌上曾表现出某些相似因素。但必须看到,中国南方地区的很多文化特征曾给予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诸多影响,如南方远古居民发明的稻作文化和几何印纹陶等,就曾漂过大海影响或传播到南太平洋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当然,影响和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东南亚的某些文化因素也曾影响到中国南方。这些问题都是老老实实在的科学问题,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多年来,我们的学术研究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对东南亚和海外的考古学现状基本不晓或知之不多,结果只能蹲在小天地里耕耘,甩不开、看不远,既不甚了解别人,也不被别人所了解,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南方古文化研究水平的提高。这种封闭式的被动研究状况,随着全方位开放时代的到来已成过去,我们必须抓住时代赋予我们的这一大

好机宜，大力加强南方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同时开展对东南亚地区古文化的了解与研究。尤其在当前，我们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使之成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据经济学家预测，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在太平洋世纪到来之时，加强南方地区古文化的研究更有其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中国《南方文物》的办刊宗旨是：以继承和弘扬南方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立足南方，面向东南亚，以文物研究和考古学为主要内涵，兼及民族学及其他有关学科和边缘学科；鼓励开拓创新，坚持百家争鸣。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欣然为《南方文物》题写刊名，正表明了考古前辈对我们寄予厚望，也增加了我们办好刊物的信心。为了实现办刊的宗旨，不断提高刊物的质量，我们竭诚祈盼得到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区文物考古界同仁及海内外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希望大家能为本刊踊跃赐稿，经常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我们改进工作。愿我们团结协作，携手并进，共同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南方文物》这块学术园地，使其四季葱绿，生机勃勃。

(本文为《江西文物》改名《南方文物》之改刊词，原载《南方文物》1992年1期)

上 编

长江文化的特点及研究的意义

长江、黄河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都是我们中华儿女主要诞生、生息、繁衍之区。以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为主体，再融合周围地区的文化，从而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五彩缤纷、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所以我们说，长江流域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有机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几千年来历代王朝都是以中原为中心，特别自夏、商进入文明时代后，中原地区有着比周围地区更为发达的青铜文化，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统治中心，所以先秦一些史书记载，所言必称“三代”，所谈必是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基本不谈或很少提及，所以千百年来使我们形成一个概念，即中原中心论。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大量考古材料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起源到底是一个地方还是多个地方？

关于长江流域文化究竟有什么特色？什么内涵？同志们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从人类诞生起，长江流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产生地之一，人类起源地很可能在亚洲，而亚洲又很可能是在我国长江上游的云贵高原一带。据现有考古材料，巫山人距今约 200 万年，云南元谋猿人距今约 170 万年，都是我国最早的人类化石。长江流域各省区的旧石器发现很多，近年来湖南发现很多，江西也有发现。过去我们总认为旧石器应到洞穴里去找，但是湖南在黄土山坡上找出旧石器，我们江西向他们学，也在安义、新余等地找到了。到新石器时代，即距今 10 000 ~ 4000 年间，长江流域的文化更是丰富多彩，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江西万年仙人洞文化、广西桂林甑皮岩文化、广东阳春独石仔以及湖南彭头山文化等，年代距今 10 000 ~ 8000 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大地上，考古学文化可以说是灿若繁星，以长江流域说，从上游开始的大溪文化到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山背文化、筑卫城—樊城堆文化，到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良渚文化等，年代在六七千年到四五千年前这个幅度内。在这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你不能说全国哪个地方最先进，哪个地区最发达，各地的考古学文化都有其特色，他们各自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我们不能说黄河流域一定比长江流域先进、发达，因为从已有的某些考古资料看，在某些方面，似乎长江流域甚至有超过中原之势。

大体在距今 4000 年左右，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代居民都相继发明了冶铜工艺，都相继经历了原始民族制的解体而进入阶级社会。尽管目前考古材料中发现最早的铜工具和用器都在黄河流域，但不能排除今后在长江流域有发现较早铜金属制品的可能性，不能说长江流域居民发明冶金术的时代很晚，更不能说是受到中原的影响而产生的，应该说，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居民基本是在同一时期发明了冶金工艺。因为，从长江流域的一些考古材料来看，诸如四川、云南、江西等地都发现有不少铸造青铜器的石范，以

石范作为铸型是青铜冶铸工艺的早期方法，青铜铸造一般是从石范过渡到陶范，如果说南方地区的青铜铸造完全是中原传过来的，那么江西吴城遗址出土 500 多件（块）石范又作何解释呢？它完全可以直接用陶范作铸型嘛，那么大量的石范铸造，不正表明了这个地区青铜冶铸工艺根基的深厚，历史的悠久！再加上长江流域铜矿资源这么丰厚，南方地区较早发明冶金术，完全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相继跨入了文明时代门槛之后，中原地区加快了发展步伐，然后又以更大的步伐迈进，很快形成了商、周高度发展的青铜文明，给予了南方及其他地区以强烈影响，从而促进和推动了周围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关于长江流域先秦古代文化的特点，我认为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尤为突出。

第一，发达的玉器制作工艺，这是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玉器制作应该说是来自南方，良渚文化高超的制作技艺，包括造型艺术，深刻地影响了中原地区，殷商墓葬中大量出土的某些玉器造型和上面的兽面纹等应来自南方，因为中原地区至今尚没有发现比南方更早、更多、更精美的玉器。包括玉器上的兽面纹，这种纹饰应该就是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广为盛行的饕餮纹的原始形态。

第二，丰厚的青铜资源及其独特的铜器制造工艺。中原有气魄宏伟的司母戊鼎青铜重器，但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2.6 米高的连坐立人像，它是怎么铸造出来的，其工艺之精湛，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江西新干商代大墓中，出土有一件高 1.14 米的大甗，双竖耳上各立一雄一雌幼鹿，回眸相顾，形态逼真，整个形体、气魄之浩大，纹饰之绮丽，誉称“甗王”当之无愧。还有一个方鼎，有两层底，正面腹部有一小门可以打开关上，两层底之间是空的，想来里面是用来烧木炭加温的，我们说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火锅。这种器形在目前是独一无二的。青铜资源据现有考古资料来看，的确黄河流域没法和长江流域比，北方目前只在河南、山西、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发现一些，但都是较晚的，最早到春秋或汉代。而长江流域从湖北大冶铜绿山到江西瑞昌铜岭再到安徽皖南的铜陵、南陵、繁昌这一带，有大量铜矿资源，蕴藏量最丰富，开采的历史也最为悠久，时代可追溯到商代。

第三，南方地区发现的陶器目前来说是国内最早的，釉陶和原始瓷的出现看来也是最早的。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下、中层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 4500 ~ 4000 年，在其中层，就出土有少量釉陶。到了相当于商代二里冈时期，吴城遗址中出土有大量原始瓷。西周至东周时期，长江下游的原始青瓷，更是广泛存在，而且还影响到了北方。以西周常见的青瓷豆为例，我看就是南方影响了中原。此后，南方的陶瓷业更是不断发展，南方青瓷业给予中国人生活的影响极为广泛而深远，瓷都景德镇、陶都宜兴，都在江南，这恐怕并非偶然，应该是有历史渊源的。

第四，盛行悬棺葬和崖葬是长江流域古代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色。从长江流域的上游到下游，整个南方地区乃至东南亚各国都较流行这种葬制。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以武夷山东西两侧即闽、赣两省区的年代最早，年代约当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上游如四川等地的悬棺葬时代较晚，多在汉以后。

第五，蚕桑的起源和丝织业的发达。目前中国最早的养蚕看来还是从南方开始的，最早的丝织品在南方。在 7000 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用于纺织的木、角、骨、牙器以及成束的植物纤维和编织的芦苇，特别出土两件刻有蚕纹和编织纹的象牙盅形器，表明当时原始纺织技术中可能已出现丝纺技术。到良渚文化时期即距今 5000 年前的钱山漾遗址中，更出土了明显的丝、麻织品，多呈平纹组织。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每件青铜器上，大多是用麻、丝织品包扎起来的。到春秋战国时期，从江西贵溪悬棺葬中出土的纺织器材来看，江南的纺织技术始终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到以后的历史时期，苏州、杭州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这绝非偶然。

第六，流行干栏式建筑。这是南方远古居民根据自身所处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而创造的一种建筑形式。在河姆渡遗址中，就出土有大量榫卯结构的建筑构件，反映南方先民高超的木作技艺，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是空前的杰出创造。

第七，发达的稻作文化。长江下游不仅是中国水稻最早栽培地区，也是目前所知亚洲及世界上最早栽培稻谷的地区之一。以后逐渐向南方各地传布，并逐渐传到黄河流域，在河南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过粳稻谷壳痕迹，表明水稻栽培技术是从南向北逐渐扩展的。

第八，发达的几何印纹陶。这是南方远古居民的另一独特创造，这曾给中原地区古代居民的制陶业以深刻影响。

这些文化特征和内涵，同志们都讲了很多，我不细讲，只是纲要式的提出来，以求教于大家。长江流域的这些文化内涵和特点，也是南方地区远古居民对中华民族的卓越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贡献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一部分，我们深入地开展这些问题的研究有什么不好呢？！既然长江流域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内涵、重要特征，又有它特定的地域，因此加强长江流域文化的研究有其特别重要意义。我们说，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这不是空的，她是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各地区、各民族的所有文化的统一体、综合体，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就必须研究各个时期、各个地域的文化，只有把各个地域优秀文化研究清楚了，才能谈得上继承和弘扬，才能批判民族虚无主义。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是长江流域经济高度发展时期，制订规划，加强对长江文化的研究，也有其现实意义。尤其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时期，我们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据经济学家预测，21 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在太平洋世纪到来之时，加强对长江流域文化的研究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长江流域的历史、地理位置和传统文化传统，是和地处南亚、东南亚地区以及其他环太平洋地区国家有特别密切的关联，很多的文化特征都给予了东南亚以及南太平洋地区以一定影响，诸如稻作文化，几何印纹陶、悬棺葬和干栏式建筑等，当然有的不一定是长江流域传过去的，有的还是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到我们，这又牵涉到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所以面对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怎样加强我们对长江文化的研究，加强对长江流域考古学的研究就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前些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史前考古学家威廉·索莱姆教

授在访问中国后，中肯地指出，中国的考古学家应扩大活动范围，尤其对华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做得很不够，没有引起中国考古学界的重视。所以加强长江流域文化的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在提出研究长江文化，并成立一个相应的研究组织或建立一个研究中心、创办一个刊物、举办有关的学术活动，我认为很有必要，也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了。我认为，过去对长江文化的研究也不是没有，有文化就必然要研究，但是过去的研究，自发的多，主动的少；各自为战的多、个体经营的多，群体研究的少。研究的内容呢，微观的多，宏观的少；局部的多，全局的少。研究的方法，以单一的学科研究的多，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少。如果长江文化研究的学术组织一旦成立，把各地学人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发挥我们的群体优势，组织多学科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势必就将把对长江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可以预言，通过一系列的学术活动，长江文化的研究必定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取得许多我们今天还无法预测的成果。

（原载《东南文化》1992年1期）

试述先越民族的两种生产工具

据有关文献记载，包括今天的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以及江苏的南部地区，曾是中国古代百越民族的活动区域。分布在东南广大地域内的古代百越文化，应该是渊源于此的诸种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的同志称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为“先越文化”^[1]，而创造这一“先越文化”的主人应该就是“先越民族”。从“先越文化”到“百越文化”、从“先越民族”到“百越族”，其间无论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考察，都有一个继承、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某些富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农业或手工业工具，如有段石铤、双肩石斧等，在“先越文化”阶段表现得相当发达，到了“百越文化”则日趋显得退化直至逐渐消失。总结和揭示出这些生产工具发生、发展和退化的规律，对于了解这些生产工具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作用及探讨古越族的发展演变源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有段石铤”一名最早是 20 世纪初德国的民族学者海尼·格尔顿（Robert Heine Geldern）提出的^[2]，后经我国已故著名民族学、考古学者林惠祥教授确认，使得这一名称沿用至今。这种有段石铤，特点是带有段脊，以便更牢的安柄，从而延长手臂，提高工效。它包括有段石铤和有段石斧等类，可概称为有段石器。这种有段石器是在一般常形石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改进而创造出来的，它是我国南方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一种最富有特征的石质生产工具。

早年林惠祥在深入研究南方古代物质文化的基础时，就曾指出：“有段石铤是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东南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它地有同有异，其明显的差异之一，是有一种特殊的石器即有段石铤。……只有有段石铤确有地方性，而可当做这一带的特征物。”^[3]林教授的这一基本观点现已被愈来愈多的考古材料所证实，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和资料，文中所引用的材料不全是新石器时代，他沿用美国人类学者拜耶（H. Otley Beyer）的分型法^[4]，将有段石铤分为初级、成熟和高级三个发展阶段，是缺乏科学地层根据的，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涌现，这种分型法无疑需要重新考量。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在南方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诸如浙江的良渚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和江西的山背文化中都有较多的有段石铤出土。岭南地区的有段石铤主要发现于粤北、粤东地区，中部低地区则有较多的有肩有段石铤，在石峡遗址下层出土的较早、也较多，尤以墓葬中出土的最为典型。墓葬中共出土石铤 151 件，有段石铤计

29件^[5]，且柄与身之间的段脊非常明显。江西修水山背遗址下层出土石镞34件，除1件为常型外，其他都属于所谓高级型的有段石镞，且段的下部显得特别长。江西清江筑卫城诸遗址，有段石镞所占比例也不少。据饶惠元先生的调查统计，有段石镞竟占到石镞总数的一半以上^[6]。筑卫城两次科学发掘，共出土石镞12件，其中有段石镞就有8件。属良渚文化早期的浙江钱山漾遗址下层，发现石镞154件，有段的16件，其他多为长方形。福建县石山遗址下层出土的有段石镞较少，且段脊都不很明显。此外，在湖北的京山^[7]、皖南的寿县、皖西南的潜山薛家岗^[8]和苏北鲁南的大汶口文化^[9]中都有这类石器的出土。在云南的滇池、洱海、滇东北地区^[10]和贵州的威宁、水城^[11]以及广西南部、西南部等地^[12]也有少量发现。

有段石镞尽管分布如此广泛，但较大量出土还是在东南地区，诸如浙江、苏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从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出土的有段石镞来看，在浙、赣、粤、闽等地目前最早发现的是距今5000年左右，在江汉平原发现的是相当于屈家岭文化中后期，时代与江西山背文化等相近。黄河下游地区最早发现的是在大汶口墓地早、中期，属大汶口文化中后期，时代要比前述诸文化为早，为此，有的同志推定“有更多的可能性是这种高级型石镞发源于苏、鲁沿海，逐渐向南传布”^[13]，而实际情况怎样呢？很有探讨的必要。应该看到，在浙江、上海、江西、广东等地出土的有段石镞，不仅数量要比鲁南、苏北大汶口文化要多得多，而且大部分型制也都是磨制精细的所谓高级型。大汶口墓地总共出土石镞63件，是石质工具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项，分别出于16座墓中，其中有段石镞只有3件，都是所谓高级型，此外尚有孤背石镞5件。既然东南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已出现大量的高级有段石镞，说明这种生产工具在这些地区开始出现的时间一定远在良渚文化、石峡文化和山背文化之前，其间必然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演变过程。因此，要探寻这种高级型有段石镞的原始形态，势必应在东南地区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去找。有的同志认为，马家浜文化早期（马家浜阶段）出土的孤背石镞，“在某种意义上看，已具有初级型有段石镞的特征，而良渚阶段刚出现了初级型的有段石镞”^[14]。近年来，他们又深入研究，追本溯源，认为河姆渡一、二期出土的那种原先认为的“镞式斧”“应是有段镞的最早型式”^[15]。如是，则太湖以南地区开始出现有段石器的时间相当早，即在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中。虽然各地有段石镞的形态演变规律并不一定完全相同，这种石器的起源也不一定就仅仅是在一个太湖—宁绍平原地区，但河姆渡一、二期文化雏形有段石镞的发现，无疑为探讨这种石器的起源提供了很有意义的线索。

考古资料还证明，有段石镞不仅是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特征，甚至进入到青铜文化时代，仍然是农业生产中富有特色的生产工具。如上海马桥中层出土的有肩石镞，特别是有段石镞较多，仅一、二次发掘出土完整的石镞就达43件，且全部都有段，其中段脊明显的有6件，其他的段脊就不甚明显，只背面有一凹槽。江西清江吴城遗址一、二、三期文化中共出土石镞34件，其中有段石镞就有16件，占出土石镞的47%以上。其类别虽也有像山背文化中那种段脊明显的高级型有段镞，但多数段脊

不很突出，也有那种背部只带一凹槽的和刃部带凹刃的有段石铤。福建县石山遗址上层仅第六次发掘出土的石铤就多至 77 件，其中有段石铤 15 件，约占 20%。甚至到铁器出现初期，如江西九江县大王岭遗址，出土的 39 件石铤中，还有 11 件系有段石铤。这些都很有说明：有段石铤在南方地区印纹陶的发展兴盛时期还占有一定比例，只是，比起新石器时代晚期那种发达的情况已有退化的趋势。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开始相对减少，而且在制造技术上已非昔日那样琢制规整、磨制精细。在形制上，那种段脊突出的高级型有段石铤日趋减少，更多的是段脊不很突出，甚至还有不少早期的拱背石铤或弧背石铤。那种背部只带一横向凹槽、凹槽的宽窄深浅不同、凹槽的部位一般多近中部的有段石铤，更明显表现出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所谓高级型有段石铤简化的结果。这种简化的凹槽石铤，在上海马桥中层、江西清江吴城以及浙江进贤^[16]等青铜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都基本一样。有意义的是，同样形制的青铜铤在浙江余杭和吴兴等地也有发现^[17]，更加有力地说明此种凹槽式有段铤似和青铜文化有着较密切关系，是南方地区有段石铤演变直至退化时的常见型式。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南方这种独具特点的有段石器，延续时间很长，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一直到青铜文化时期。如同几何形印陶纹一样，也经历了发生、发展和退化的过程。它的起源，目前只有太湖及其以南地区的材料，即产生于 7000 年前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文化及马家浜文化。兴盛发达期则是 5000 年前的诸如良渚、山背、石峡等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到南方各地相继出现青铜文化后，它还占有一定比例。迨至铁农具出现后，才更日趋减少，只有边远地方延续很晚。如在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中还发现用有段石铤随葬^[18]。甚至到近代，有的地区如台湾高山族人民仍在^[19]使用。

有段石铤的发展演变序列（见文末附表），可以初步概略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原始型。特点是弧背，整个背部弧线无明显分界，可简称为弧背铤，在河姆渡一、二期都有出土。

第二，初级型。特点是拱背，背部上下两段弧形斜面之间有明显的分界线，可简称为拱背铤。此种型式又可分为两种^[20]：一种是 A 型，分界线不明显，马家浜文化早期和河姆渡三期出土较多；一种是 B 型，分界线明显，出土于浙江桐县乡罗家角一类马家浜文化晚期地层中。可见这两种拱背铤也有早晚之别。

第三，高级型。特点是背部有一道高脊突起，形成上、下厚薄不同的两段，整个体型显得较为平直，可简称为高脊铤。它是此类石器最发达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常见型式，因而不妨沿用林惠祥教授的提法，称为高级型。此种高脊铤，同样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A 型，高脊的折度呈斜面钝角，多发现于江浙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另一种是 B 型，高脊的折度多呈直角，常见于南方其他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从江浙地区更多出现 A 型高脊铤看，似乎这种型式铤的出现当早于 5000 年以前。

第四，退化型。特点是背部近平直，并带一横凹槽，可称之为凹槽铤。

上述这种从弧背铤→拱背铤→高脊铤→凹槽铤的发展演变序列，是就有段石铤的基